

国外青年文化  
研究译丛

# 亚文化之后： 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

**After Subculture:**

Crit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Youth Culture



安迪·班尼特 基思·哈恩—哈里斯 编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文化译介小组 译  
孟登迎 校

# 亚文化之后： 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

**After Subculture:**

Crit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Youth Culture

---

安迪·班尼特 基思·哈恩—哈里斯 编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文化译介小组 译  
孟登迎 校

(京) 新登字083号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英] 班尼特,[英] 哈里  
斯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文化译介小组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  
版社，2012.3

ISBN 978-7-5153-0490-8

I. ①亚… II. ①班…②哈…③中… III. ①青年—文化—研究 IV.  
C9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70948号

---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01-2009-1006

Selection, editorial matter and Introduction © Andy Bennett and Keith Kahn-Harris 2004  
Individual chapters (in order) © Peter J. Martin, David Chaney, Geoff Stahl, Ben Carrington  
and Brian Wilson, Paul Sweetman, Sian Lincoln, Keith Kahn-Harris, Hilary, Pilkington,  
Paul Hodgkinson, Gerry Bloustien, Andy Bennett, Simon Frith (Afterword) 200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China Youth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St. Martin's Press, LLC,  
under the title *After Subculture* by Andy Bennett and Keith Kahn-Harris.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s have  
asserted their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出版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 址：www.cyp.com.cn

责任编辑：王钦仁

编辑电话：(010) 57350507

门市电话：(010) 57350370

印 刷：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

开 本：700×1000 1/16

印 张：17.25

插 页：2

字 数：242千字

版 次：2012年3月北京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4000册

定 价：35.00元

---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 目 录

## 译丛总序 / 1

民间恶魔、身份认同还是仪式抵抗？——西方青年文化研究的历史和  
多重视野 孟登迎 / 3

“青年文化”的发现史 / 4

芝加哥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 / 7

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 / 11

“后亚文化”理论及研究 / 14

青年文化研究的未来 / 17

注释 / 19

## 各位作者简介 / 1

## 致 谢 / 5

序 言 安迪·班尼特 基思·哈恩-哈里斯 / 1

亚文化理论的起源 / 3

亚文化理论和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 5

对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种种批评 / 8

后亚文化理论 / 14

亚文化争论的延续意义 / 18

注释 / 23

## 第一部分 理论阅读 / 25

### 第一章 文化、亚文化与社会组织 彼得·J. 马丁 / 27

文化、亚文化和社会学话语 / 29

韦伯和“各种集体实体(Collective Entities)概念” / 33

集合概念的解构 / 35

反思“亚文化” / 37

结论 / 41

### 第二章 碎片化的文化和亚文化 大卫·钱尼 / 44

亚文化与文化多样性 / 44

变化着的文化形式 / 45

变化着的文化特征 / 52

文化的碎片化 / 56

注释 / 58

## 第二部分 个案研究 / 59

### 第三章 “这就像加拿大的缩影”:蒙特利尔的场景音乐

杰夫·斯塔尔 / 61

对场景进行定位 / 62

蒙特利尔 / 67

“衍生唱片” / 68

结论 / 74

致谢 / 76

注释 / 76

### 第四章 舞蹈的国度:青年亚文化理论再思考 本·卡林顿 布

赖恩·威尔逊 / 77

舞蹈音乐和亚文化理论 / 78

观点论辩 / 84

结论 / 91

致谢 / 93

注释 / 94

## 第五章 游客还是旅客? “亚文化”、自反性身份和新部族社交

保罗·斯威特曼 / 95

自反性和身份 / 97

新部族和新兴的社交习惯(socialities) / 102

游客还是旅客? / 106

结论 / 110

注释 / 111

## 第六章 少女的“卧室文化”:编码与分区 斯安·林肯 / 113

研究卧室文化 / 114

编码和分区 / 115

20世纪90年代的卧室文化 / 118

创造卧室空间 / 120

编码或者分区? / 124

结论 / 126

注释 / 127

## 第七章 平淡无奇的亚文化?全球极端金属乐场景中的越界与世

俗 基思·哈恩-哈里斯 / 128

极端金属乐场景 / 129

日常生活与场景参与 / 133

世俗的逻辑 / 135

结论 / 140

## 第八章 青年的全球本土化生存策略:日常文化实践中的空间、

权力和交往 希拉里·皮尔金顿 / 143

另类现代性和亚文化理论 / 144

现代性、消费和选择:“后亚文化主义”的先决条件? / 145

“革新派(Progressives)”和“正常人(Normals)”:全球本土化的生存策略 / 148

“革新派” / 151

“正常人” / 154

隐藏在风格之下:空间、权力和交往 / 155

结语 / 157

注释 / 160

## 第九章 哥特场景和(亚)文化实物 保罗·霍德金森 / 162

哥特场景以及对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异议 / 163

亚文化的替代词 / 168

(亚)文化实物 / 170

自给自足(self-sufficient)与自我独立(self-contained)? / 175

结论 / 176

注释 / 176

## 第十章 “七星酒吧”的“《巴菲》之夜”：“全球本土”层面的“亚文化”偶遇 格里·布鲁斯蒂恩 / 178

亚文化群体都去哪儿了? / 178

青年文化群体、区域性和游戏空间 / 179

“虚构的场所”还是“所有人都认识你的地方”…… / 182

严肃的游戏和空间 / 184

“公开承认自己的隐私” / 185

时间、地点、主体性的重要性 / 187

七星变成了安格斯(The Angas) / 188

其他备选项:希尔顿酒店(The Hilton)和540酒馆 / 189

高杰酒吧 / 189

白白忙碌一番? / 190

结论 / 190

注释 / 191

**第十一章 虚拟亚文化？青年、身份认同与互联网**

安迪·班尼特 / 193

亚文化和互联网 / 194

当代青年文化中的在线 / 离线连续性 / 197

作为一种创造性策略的虚拟亚文化 / 200

结论 / 205

**后 记** 西蒙·弗里斯 / 207

**参考书目** / 214

**索 引** / 233

**译后记** / 239



# 序 言

安迪·班尼特 基思·哈恩-哈里斯

20世纪70年代中期,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简称 CCCS)发表了一项对于“二战”之后英国工人阶级青年的原创性阐释成果——《通过仪式抵抗》(*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Hall and Jefferson, 1976);从此,“亚文化”这一概念一直主宰着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相关领域对于青年、时尚、音乐和休闲的研究。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吸收了葛兰西(Gramsci, 1971)和阿尔都塞(Althusser, 1971)的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把战后的一些青年亚文化群体——如泰迪男孩(Teddy boys, 又译“阿飞男”、“无赖派”——中译者注)、摩登派(mods)和光头党(skinheads)——解释为工人阶级抵抗英国社会中居于支配霸权地位的各种体制(institutions)的一些小团体(pockets)。《通过仪式抵抗》显现出学术界第一次试图为音乐和各种受时尚引导的青年文化提供系统的社会学理论,因此,在青年研究和作为学术分科的青年文化教学这两个领域,它很快成为一部至关重要的著作。这项研究,连同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 1978)、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 1979)以及安吉拉·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 1980)等一批理论家在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期(post-Centre)的研究成果,依然对当代学术研究和青年文化学科的教学产生着强烈的影响。

本书试图对在青年研究领域作为分析模式的亚文化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再评价。有人可能会质疑把亚文化批判作为关注焦点的必要性,因为这类批判目前在社会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相对来说已经很普遍

了(例如,McRobbie, 1980; Clarke, 1981; Brake, 1985; Cohen, 1987; Redhead, 1990; Harris, 1992)。而且,自 20 世纪 70 年代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研究界很少有人从肯定的方面去使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提的亚文化概念,好像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再为这一概念提供“另一种”批判。但是,这些对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亚文化概念的批判性方法持续而普遍的出现,即使说不上让人生奇,也会是一个让人感到困惑的问题。

亚文化概念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持续而普遍的评判,一个原因就在于,在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期(post-CCCS)有关青年、时尚和音乐的研究当中,它依然是一个居于中心地位的有定义功能的概念,但被当做一个日益任意的概念样式来使用。正如班尼特(Bennett, 1999a)所发现的那样,亚文化“已经无须辩驳地成了一个‘包罗万物’的方便的术语,青年人、时尚和音乐所涉及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被囊括其中”(p.599)。然而,虽然亚文化一词被广泛使用,而且作为一个理论化的概念它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之前早就存在,但是对于亚文化的各种批判,却几乎都是围绕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来进行的。因而,对于亚文化的“争论”依旧被锁定在一个相对狭窄的批评话语范围之内。因此,有必要去超越一种关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的批判性评价,提出一种对于“亚文化”概念本身的持续性的评价。

随着青年文化领域本身的改变,进行这种评价的需要变得更加迫切了。各种青年时尚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益扩散(参照 Polhemus, 1997),加之“风格混杂”的机会日益增多(McRobbie, 1994),自然就不可能再稳固地形成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强调的那些有明确风格的群体,这最终导致了青年文化的日益分裂。赫伯迪格(Hebdige, 1979)在他对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英国朋克摇滚乐(punk rock)的研究当中,提出了一个富有争议的观点:“朋克以‘胡闹(cut up)’的方式复制了战后工人阶级青年文化的整个服装裁缝史,并拼合了源于完全不同的时代的各种元素。”(p.26)赫伯迪格在朋克当中确认的这些修补匠式(bricoleurist,疑为 bricoleurist 之误——中译者注)的特

性,现在已经更加广泛地凸现于青年的各种风格创新当中。马格莱顿(Muggleton, 2000)支持这一观点,他将“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描述为“亚文化破碎和增生的时代,充斥着大量旧时尚的复兴、混杂和转换,各式各样的风格并存于某个时代的关节点上”(p.47)。在如此复杂的文化领域,亚文化概念的适用性问题,连同它带有的所有文化的和空间的关联性含义,也已经变得更加紧迫。

我们编辑这本论文集将遵循三条原则。第一,要审查和评估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以及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期人们使用亚文化概念的各种方式。第二,要思考在一个日益展现为文化碎片特征的世界里,使用亚文化这一概念是否还具备理论的和经验的合法性(Chaney, 2002a)。第三,要思考这一术语是如何变通的,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以新的方式被重新使用或挪用——或者,倒过来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于这个术语的使用曾经在多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它的含义。在这篇序言中,我们首先必须简略回顾一下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亚文化理论,并要考察一下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亚文化的核心成果发表之后所引发的批判性争论中出现的一些关键性的议题。这篇序言是对本书各章内容的概括;在这些章节中,关于亚文化的争论得到了推进,在当代青年研究中作为分析概念的亚文化的价值得到了重新评价。

## 亚文化理论的起源

对于青年的历史研究表明,几个世纪以来由青年人组成的帮派和团体所具有的那些特征,近来被称为“亚文化的”感性特征(sensibilities)。此处适用的一个相关个案,就是皮尔森(Pearson, 1994)对于17和18世纪伦敦“学徒工”的解释。(依据皮尔森的说法)这些学徒“被看做一种独立的组织系统或亚文化……(成人社会)努力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规范这些学徒的行为,他们被禁止参加足球比赛、音乐演出或在客栈喝酒”(p.1166;另参见Pearson, 1983, pp.190-4)。罗伯茨(Roberts)在描述“北部奔袭族”(Northern Scuttlers)——一个在英格兰西北部的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Salford)这两所相邻城市当中建立起来

的青年团伙——的时候，也提供了类似的情况。依据罗伯茨的解释 (Roberts, 1971), 奔袭族“有他们自己的服饰风格——统一形式的衬衫 (the union shirt)、喇叭裤和厚皮革腰带, 上面刺有带着大钢扣和厚铁重物的各种奇特的图案”(p.123)。德国的青年理论家德特勒夫·蒲克 (Detlev Peukert) 在其对于德国 20 世纪 20 年代“野蛮团伙”(Wilden Cliquen) 所做的研究中, 也提供了一个类似的个案。正如蒲克(1983)所揭示的那样, 这些青年团伙除了有显著的风格化的着装之外, 还佩戴“彩色的手镯、耳环, 身上还刻有彩色的文身”(p.67)。

“亚文化”这一术语究竟在什么时候第一次被用于描述青年在视觉上和行为上所具有的显著感性特征, 我们尚不清楚。托尔森(Tolson, 1997)认为, 虽然 19 世纪的慈善家亨利·梅休(Henry Mayhew)的著作还没有提到“亚文化”, 但从中可以看到亚文化理论的基础。梅休对伦敦贫困人口的研究, 促成了一种对于工业城市环境中的贫困问题的本质和根源的新的公共意识。尽管梅休的著作并不是专门针对青年问题, 但这些作品以及他对于“亚文化”的提及, 已经暗示出一个由种种越轨行为构成的复杂人际网络, “穷人”将此种关系网络用作他们日常生活过程的一种生存手段。

正是这种对于“亚文化”的比较宽泛的理解, 为这一概念在 20 世纪初期主流社会学著作中的最初出现确立了基础, 此时它成了著名的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框架。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家向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对于越轨行为的心理学阐释发出了挑战, 这种心理学阐释是由诸如恺撒·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等理论家提出的, 他们认为越轨行为是由于人们存在一种“犯罪人格”(参见 Sapsford, 1981)。而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家则认为, 在社会文化语境当中研究的越轨行为, 应该被解释成一种“受文化规范控制的”正常反应, “而不是一种表现心理缺陷的症状”(Firth, 1984, p.40)。

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家提供了一系列的解释模式, 用以说明越轨亚文化群体是如何对其各种越轨行为进行“规范”的。贝克尔(Becker, 1963)认为越轨行为是贴标签(*labelling*)的结果, 即“一些社会集团通过制定那些让违反它们的人构成越轨行为的规则去制造越轨行为, 将

这些规则用于特定的人群并给他们贴上局外人的标签”(p.9)。按照贝克尔的说法,越轨的亚文化群体被锁定于一个“越轨行为扩充”的过程当中。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对于主流社会的最初的否定性反应,会导致这些亚文化群体进一步做出越轨的行为,后者又反过来强化了(主流社会)对于他们的诬蔑。默顿(Merton, 1957)将“手段与目标”的概念引入一种解释模式当中,试图将越轨行为解释为那些在社会上缺乏既定“手段”的团体用以获取物质和文化收益的一套解决方法。依照默顿的观点,越轨亚文化群体只有在他们制造越轨手段以获得大多数人通常追求的社会目标的时候,才呈现出越轨特征。最终,马札和赛克斯(Matza and Sykes, 1961)质疑并反驳了如下观念——在所有情形中的“越轨”亚文化群体都会诉诸某种反社会的行为方式。相反,他们认为许多这样的团体都是合法的亚文化群体,他们的地下价值观(*subterranean values*)体系虽然在提供各种反传统的(non-conformist)追求愉悦和兴奋的途径方面显得有些偏离正统,但并不会对主流社会构成同等的挑战和破坏。

## 亚文化理论和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芝加哥学派将亚文化看做是理解社会境况当中的越轨行为的一种手段,这为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将亚文化作为理论框架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原则。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发表之前,英国的青年研究一直对社区(*community*)和区域性论题保持着强烈的关注,后者在许多方面反映出芝加哥学派在英国语境中产生的影响。例如,梅斯(Mays, 1954)对于利物浦市的青少年犯罪的研究,认为这些越轨行为是当地传统的构成部分,因为当地的青年男性接受了越轨的模式并将其付诸实施,这些模式已经成为利物浦许多下层社会居住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与此类似的想法,也出现在帕特里克(Patrick, 1973)对于20世纪60年代英国格拉斯哥(Glasgow)帮派的研究当中。在帕特里克看来,城市当中某些区域长期存在的帮派文化,受社会经济困苦的历史周期所左右。这种对于区域性和社区的强调,一定程度上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早期著作中也得到了坚持:

比如,科恩(Cohen,1972)关于“亚文化冲突与工人阶级社区”的研究。科恩将研究的重心集中到对住在伦敦东部居住区的青年人的研究,认为青年人在群体风格上的反应与他所说的“社区的神奇复兴”是相关的。也就是说,由于20世纪50年代城市经济的恢复发展,家庭被重新安置在“新城镇”和现代的居住区,随之带来了传统工人阶级社区的破裂,因此青年人试图复兴一种对于社区(共同体)的感觉。

然而,随着《通过仪式抵抗》在1976年的出版,亚文化研究的重心从以前对区域和社区的强调转向对阶级的宏观透视,青年亚文化群体在此被当做是正在发生的阶级斗争的引人注目的指示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采用了芝加哥学派原初的前提假设——亚文化群体提供了理解越轨行为的钥匙,把越轨行为理解成亚文化群体面对特殊社会环境时的正常行为,从而把这种亚文化越轨模式再次作为一种解释方法,用来解释英国战后工人阶级青年各种带有风格色彩的反应,并认为后者体现了一系列针对英国战后社会所发生的各种结构性变革的集体反应。

英国和美国在战后阶段的特征表现为日益增长的经济富裕。尤其是英国,由于暂时脱离于由德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等主要出口国构成的世界市场,意味着这个国家获得了一个空前快速的经济增长率。在1951年至1961年间英国的生产量增长了35%,实际平均收入每年增长了大约2.7%(Leys, 1983, pp.60-1)。因而,以前为富裕阶层独享的奢侈的消费主义,“已经在除了最贫穷的群体之外的所有人群当中开始滋生起来”(Bocok, 1993, p.21)。

依照一些评述者特别是茨威格(Zweig, 1961)的观点,战后消费者的激增开始侵蚀传统的阶级区分,因为富裕的工人阶级实际上接受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战后青年的时尚也被看做是这一进程的一个方面,它促使青年人融入一种统一化的(unified)青少年消费文化当中(Abrams, 1959)。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向这种关于战后青年的解释提出了挑战。这个中心宣称,迅速出现的这些基于时尚之上的青年文化,尽管确实显现了新近习得的花钱习惯,但从更深的层面却表现出阶级分化依然是战后英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该中心认为,工人

阶级青年日益增长的消费力，尽管会将他们塑造成消费者的形象，但却根本无法从实质上改变他们的生活机遇(life chances)：

没有一种“亚文化的解决方法”可以解决工人阶级青年所面临的失业、在教育方面的劣势、有害的义务教育(compulsory miseducation)、没有前途的工作、劳动的常规化和专业化，以及低微的工资和技能的丧失等问题。各种亚文化的策略无法满足、应对或适合这一时代为整个阶级所呈现的各种构建维度。(Clarke *et al.*, 1976, p.47)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用的“青年抵抗”这一概念，是从葛兰西的著作(Gramsci, 1971)中挪用过来的；葛兰西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是围绕着正在进行的“霸权(hegemonic)”斗争展开的。依据葛兰西的观点，由于资本主义的进化，资产阶级的权力无法再通过控制而必须通过同意来赢得。这牵涉到从经济控制向意识形态(霸权)控制的转变。但是，霸权力量特有的本性，意味着它可以经受住那些来自从属阶级(subordinate class)的各种挑战。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把葛兰西的模式与战后的英国工人阶级青年联系起来，强调这个创造各种亚文化方式来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同时会涉及对空间的赢取，这些空间包括“街坊社区和机构中的文化空间，用于休闲和娱乐的真实时间，以及街角的真实地盘”(Clarke *et al.*, 1976, p.45)。他们认为，为各种亚文化身份认同的集体表达所需的空间而进行的这种协商(negotiation)，对那种已经嵌入在“斗争剧场”内部的权威构成了一种挑战，而依据葛兰西的观点，这正好体现了阶级关系在晚期现代社会的特征(同上，p.44)。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做的一系列个案研究，考察了一些有关各种亚文化抵抗“策略”的具体事例。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 1976)关于光头文化的文章发展了菲尔·科恩(Phil Cohen, 1972)的著作，后者认为光头风格表现了“一种通过‘聚众滋事’来重塑(re-create)传统工人阶级社群的努力，以此来替代后者实际上的衰落”(Clarke, 1976, p.99)。杰斐逊(Jefferson)通过对泰迪男孩风格的考察，认为这种

风格反映了这些“泰迪族”(Teds)“在星期六晚上‘打扮得整整齐齐却无处可去’的体验”(1976, p.48)。泰迪男孩的相对富裕使得他们可以“买进(buy into)”一种中产阶级的形象——由萨维尔街(Savile Row)的裁缝在20世纪50年代所恢复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Edwardian)服装,最初就计划投放给中产阶级市场。杰斐逊指出,泰迪男孩的“服饰体现出一种用来表达他们的符号现实(symbolic reality)并与之进行协商的象征方式,也体现出一种给他们的社会处境赋予文化意味的象征方式”(同上, p.86)。与之类似,赫伯迪格认为摩登派风格是对每周工作日的世俗老套(mundane predictability)的反应,并且认为摩登派试图“通过完全控制自己的个人状态——他的外表和对休闲爱好的随意选择”——来补偿日常工作的平庸(1976, p.91)。

虽然战后的各种亚文化群体表现出了所有这些符号上的创新性,但反抗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亚文化群体以一种想象的方式“解决”那些在具体的物质层面依然未能解决的问题(Clarke *et al.*, 1976, pp.47-8)。而且,依据赫伯迪格的观点(1979),现有的所有亚文化风格的抵抗性,最终都会被时尚工业所收编或者商品化,从而失去锋芒而变得很折中(compromised)。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因此提供了一种对于亚文化的苦乐参半的分析,即在赞美它取得的成功的同时,又指明它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 对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种种批评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提出的亚文化抵抗模式虽然对青年文化研究有很大的影响,但一直受到来自许多方面的批评。默克罗比和嘉柏(McRobbie and Garber, 1976)特别指出,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无法对女孩参与亚文化群体提供合理的阐释。她们认为,尽管亚文化可能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现象,但亚文化群体决不是专属于男性的。<sup>1</sup> 男性社会学家当中存在着不太情愿研究家庭领域和家庭关系的倾向,这也使得女孩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描绘的亚文化世界中处于缺席状态。正如默克罗比所观察到的(1980),“在讨论越轨现象和青年的各种社会学于20世纪70年代盛行的时候,家庭社会学



是所有学者最少喜欢选择的领域”(p.68)。然而,在默克罗比和嘉柏看来,家庭生活领域实际上为少女当中有活力的各种亚文化行为提供了一个源泉。这两位学者通过对“女孩与亚文化”(1976)的研究,确认在低龄少女们(pre-teenage girls)当中有一种强大的“女流行音乐迷(Teeny Bopper)”文化。这种女流行音乐迷文化,围绕少女们对家庭空间的创造性使用而展开,比如她们卧室墙壁的装饰——贴着那些流行音乐偶像的招贴画,在起居室放唱片(play records),读青少年杂志,观看诸如“流行音乐排行榜(Top of the Pops)”那样的电视节目。默克罗比和嘉柏(1976)认为,女流行音乐迷文化“可以看做是对那些控制女孩生活的有选择性的、专制结构的有目的的对抗(reaction against)”(p.220)。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青年研究还存在一个与其融为一体的深层问题,这就是,他们的研究把战后青年消费主义的各种模式无条件地等同(unqualified equation)于各种工人阶级的抵抗观念。正如马格莱顿(2000)所指出的,这一预设前提建立在一种本质主义的观点——认为亚文化群体的成员绝对是排外的,或者主要是工人阶级——之上,但这只是理论推测而不是已经被证实的事实。而且,即使我们接受战后的青年消费主义首先是由工人阶级青年推动的,也依然很难接受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得出的如下论断:生活消费品一律被用于各种抵抗策略。正如班尼特(1999a)所说:

这种论点建立在一种非常不确定的观念之上,即工人阶级青年已经获得了在日益增多的消费品当中进行自由挑选和选择的条件,他们以某种方式被推回到一种阶级现实,并以此来解释他们对这些日用品的迷恋。或许有人会更进一步认为,战后的消费主义为青年提供了一个脱离他们传统阶级身份的机会,青年人日益增强的消费力促进并激励出一些对新的、自我建构的认同形式的实验。(p.602)

有一种观点认为,战后的时尚为青年人提供了建构新身份认同的机